

贫困脆弱性理论与政策研究新进展^{*}

蒋丽丽

内容提要:在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中的贫困脆弱性人口比重远高于总贫困人口比重,在贫困线以上,还有很多人存在可能陷入贫困的风险。因而,有关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是当前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热点话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国外最新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讨论了如下三个问题:如何测量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理论的公共政策含义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介绍了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测量方法、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并评述了它们的差异和优劣。在公共政策含义方面,本文阐述了经济学家针对暂时性贫困脆弱性提出的精准帮扶措施,针对结构性贫困脆弱性问题提出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完善措施。最后,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的努力有:使测算贫困人口福利的维度更加丰富,并找到贫困人口福利的最佳分布函数;找到不同计量方法之间的比较标准;深入探索贫困脆弱性发生的机制。

关键词:贫困 贫困脆弱性 反贫困计划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够降低贫困,这是因为,如果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个人的收益不均等,那么增长的减贫效应的大小就取决于贫困人群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增长孰快孰慢。这也就是所谓的不平等螺旋(unequalizing spiral)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制定和实施反贫困计划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关于如何实施反贫困计划,当前的研究焦点是如何识别出反贫困计划应该针对的对象,不应该仅仅采用贫困人口数量(headcount poverty)、贫困差距(poverty gap)以及贫困严重度(poverty severity)指标,还应该采用“人头数的贫困脆弱性”(headcount vulnerability)、“脆弱性差距”(vulnerability gap)以及“脆弱性严重程度”(vulnerability severity)等指标来测量贫困状态(Klasen & Waibel, 2014),从而制定反贫困政策。这里的概念是“贫困的脆弱性”。世界银行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未来贫困或者更加贫困的概率。农作物收成下降、食品价格上涨、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家庭供养结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提高贫困脆弱

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世界银行又将贫困脆弱性概念引入到对贫困的定义:除了指以收入为主的基本社会福利指标的降低之外,贫困还包括各种外部冲击导致的贫困脆弱性(World Bank, 2000)。如果将研究目标确定为“贫困问题”,那么,研究的对象是福利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所有家庭;如果将研究目标确定为“贫困脆弱性问题”,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在面临风险以后福利状况恶化并陷入贫困的家庭,也在研究范围之内(Bartfeld et al, 2015)。许多研究表明,贫困脆弱性家庭(或个人)的统计比例会高于贫困家庭比例(Haughton & Khandker, 2009)。相比之下,贫困脆弱性概念不是事后的确定性的统计分析,而是一种事前的预判和测量,政府可以预先针对发生贫困概率较高的家庭给予帮助,防患于未然,因而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据此,本项研究试图对有关贫困脆弱性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进行综述。

二、如何测量贫困脆弱性

反贫困政策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公共政策以来,研究人员发现,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测量贫

* 蒋丽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32875604@qq.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困的脆弱性,从而识别出政策针对的对象(Klasen & Waibel, 2014; Ward, 2016)。总结起来,文献中出现了如下三种测量贫困脆弱性的理论方法: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 VEU)测量方法;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测量方法;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 VER)测量方法。

(一)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测量方法

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测量方法由 Ligon & Schechter(2003)提出,他们的研究发现,以往对家庭福利的测量多集中在收入和消费两个指标上,反贫困政策也多针对这两类指标,而忽略了风险的因素,比如家庭成员健康恶化导致的冲击、农业收成导致的冲击、社会结构不利变化导致的冲击等。因此,他们首先选取了包含风险偏好因素的效用函数作为对福利的测度,再通过计算贫困线水平的期望效用、期望消费的效用/utility of expected consumption)、消费效用的期望(expectation of consumption utility)等变量,将贫困脆弱性拆分为贫困和风险的组合,并进一步将风险拆分为加总风险(aggregate risk)、特殊风险(idiosyncratic risk)、不能被解释的风险和测量误差(unexplained risk and measurement error)。风险偏好程度可以用 Arrow-Pratt 方法进行衡量。这种脆弱性测量方法将反映个人偏好的效用函数引入贫困脆弱性测度中,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消费水平的期望效用低于确定性等值效用(贫困线代表的消费水平)的程度。效用函数以消费水平作为衡量标准,具有不变的风险厌恶系数,效用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但边际效用递减(Naude et al, 2009)。该方法需要计算出贫困线所代表的效用水平与人们消费的期望效用水平之差,若家庭消费的期望效用水平位于贫困线效用水平之上,则不存在贫困脆弱的问题;若家庭的期望消费效用水平低于贫困线所代表的期望效用水平,则家庭此时陷入贫困,二者之差为其脆弱性程度。此后,在这种静态脆弱性测量方法定义之上,学者们加上时间趋势,得到了动态的定义。Ligon & Schechter(2003)选取保加利亚 1994 年的调查面板数据,用食品支出作为消费水平的测度,控制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包括家庭收入状况、雇佣状况、领取养老金或抚恤金等的人数等。研究结果显示,该国的贫困脆弱性水平引致原因中,有 55% 来源于收入低下,13% 来源于协同性风险,0.7% 来自

于异质性风险,其他来自于不可解释风险。由此可见,贫穷和风险在降低福利水平时起到的作用相当。贫困部分是贫困脆弱性的组成部分,比例占到整个贫困脆弱性成因的一半以上。在造成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各类风险中,不能被解释的风险是脆弱性最重要的风险来源,因此对异质性风险的分解估计十分必要。在最近的研究中,Klasen & Waibel(2014)对东南亚以及 Grech(2015)对欧洲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类研究方法的争论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时间跨度和什么频率的数据。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考虑到风险的冲击,应该利用更加高频的数据(Ward, 2016);另外的学者认为,对于慢性贫困而言,最为有用的数据是跨期较长的数据,比如有关家庭消费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Ligon & Schechter, 2003; Klasen & Waibel, 2014)。

(二)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

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由 Pritchett et al(2000)、Hoddinott & Quisumbing(2003)、Chaudhuri(2001, 2002) 等提出,由 Klasen & Waibel(2014)等进行了重大改进。其基本逻辑是,用可观测到的变量和冲击因素对收入进行回归以得到未来收入的表达式,进而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到未来收入低于某一值(通常是贫困线)的概率,这个概率就被称为脆弱线。由于家庭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需要考虑异方差问题。由于 VEP 方法是在充分考虑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后对未来贫困概率的估计,同时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Pritchett et al(2000)试图对印度尼西亚贫困地区的脆弱性进行测度。他们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在未来几个月内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并且,首先定义贫困线为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代表一个与既定支出水平相一致的福利水平。每期的支出水平都是经过价格水平调整的实际支出,将其与贫困线的大小关系进行比较。这种利用一般性支出作为指标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Ward, 2016)。基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贫困脆弱性的大小也与时间维度有关,时间越长,家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家户的脆弱性程度也越高。特别地,这种估计还包括了对未来陷入贫困的缓解机制的思考(Grech, 2015)。未来期里,人们会动用自己的存款、向他人借款,或者其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保险措施来平滑单个家庭收入的变动,以使得各期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因而这种观测的支出水平不仅反映了收入

风险,还隐含了人们平滑家庭消费的能力。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是脆弱的呢?为了对脆弱家庭的总数量进行更精确的测量,Pritchett et al(2000)定义了陷入贫困风险的临界值,概率大于这一临界值即可断定该家庭是脆弱的。这个临界值显然不是由最优规划求解出来的,而是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地经济环境、平均个人禀赋以及资源状态决定的(Klasen & Waibel, 2014)。Pritchett et al(2000)将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高于50%定义为是贫困脆弱的,因此设定临界值为0.5。他们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预先给定贫困线的情况下,总人口中贫困脆弱性人口比重远高于总贫困人口比重,10%~30%的人口非常有可能陷入贫困的风险之中。此外,不同性别、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区、不同的土地拥有数量、户主职业所在的部门的不同等也会造成贫困脆弱性的群体差异。有关“贫困脆弱性群体差异”的研究得出较之于“贫困群体差异”研究更为多维度的政策建议,比如有关防范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的保险机制等(Ravallion & Chen, 2006; Klasen & Waibel, 2014)。这佐证了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相较于以往的贫困研究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方法思路清晰,理解上较为直观,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测量也比较容易实现。但从测度结果上看,它最终只能对家户是否是贫困脆弱进行定性判断,从总人口中分离出那些较脆弱的家庭,而没有对这些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进行定量的研究,因此只能反映贫困脆弱性家庭的总数量,不能反映每个家庭脆弱至贫的深度(Bartfeld et al, 2015)。

针对这种没有对贫困脆弱性的程度进行度量的缺点,Hoddinott & Quisumbing(2003)对以上模型进行了修正,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不同状态下损失程度的期望值。按照禀赋、资源占有水平来看,家户有多种状态,在家庭成员变化冲击、农作物收成冲击以及社会结构变化冲击下,不同家户的承担能力又有各种状态,因而有必要定义不同状态下的损失程度的期望(Celidoni, 2013)。这种方法比之前的概率计量方法更进了一步,使得不同贫困脆弱性家户的贫困脆弱程度可以度量和比较,显示出不同的家户陷入贫困的深度的差异,有助于定位那些对扶贫政策需求最迫切的贫困人口,有利于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效果。特别是对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呈现地区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方法的优势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计量模型可以看出,在当期测量

时,下一期收入只能通过估计而得,因而与Pritchett et al(2000)的模型相同,贫困脆弱性测量的精确性也很大程度依赖于此收入函数的生成方式。无论是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还是逻辑斯蒂(logistic distribution)分布,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另一种较有影响力的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法来自于Chaudhuri(2001, 2002)。区别于前两种通过收入和支出水平来测量贫困脆弱性的方法,作者采用消费水平作为参考的标准,提出了一种在面板数据期数有限、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利用单期截面数据对下一期贫困脆弱性进行估计和预测的方法。这里的脆弱性仍然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某家庭在时期 t 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被定义为该家庭在 $t+1$ 期陷入贫困的概率: $v_{ht} = Pr(c_{h,t+1} \leq z)$ 。 $c_{h,t+1}$ 表示家庭 h 在 $t+1$ 期所对应的消费水平, z 表示既定的贫困线所代表的消费水平。脆弱性就表示为下一期的消费水平小于或等于贫困线所代表的消费水平的概率 Pr 。第 $t+1$ 期的消费水平在当期是未知的,因而 $c_{h,t+1}$ 表示的就是家庭 h 在 t 期对下一期做出的消费预期。研究发现,家庭各期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的财富水平、目前的收入水平、未来收入的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在面临各种收入冲击时平滑其消费的能力等因素。以上所有因素又依赖于各种可观测的和不可观测的家户特征,比如健康状态、资源禀赋状态等。基于此构建了如下消费函数: $c_{ht} = c(X_h, \beta_t, \alpha_h, e_{ht})$ 。其中, X_h 表示一系列可观测的家庭特征, β_t 是表示经济体在时期 t 的状态向量, α_h 表示不可观测的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时期 $t+1$ 的贫困脆弱性本质上就是家庭在 t 期的未来消费预期。如何估计这里的家庭固定效应呢?可假设某个家庭消费的对数值是可观测变量和残差的函数(比如可观测的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家庭受教育程度等),设定均值为零的特殊性风险,让不同时间的 β 值取值法则一样,家庭未来消费波动只来自于特殊性风险,这就使得不可观测的家庭随机效应在此时被舍弃,同时经济结构对家庭的影响(由 β 反映)在不同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即可以不考虑未预期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假设特殊性风险在不同时期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其变化程度和可观测特征存在常见的函数关系,根据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即可得到家庭的固定效应(Celidoni, 2013)。这些方法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不同背景的家户面对不同冲击后形成收入损失时,如何判断他们是否能够平滑其消费以

至足以防止其跌入贫困的临界点,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形成共识(Grech, 2015)。

进一步地,Dutta et al(2011)提出了考虑到贫困线水平以及目前生活水平的一种复合的测量方法。首先,由于每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对于是否脆弱的判断不应只取决于贫困线水平,而且还与人们当期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不同家庭低于贫困线所代表的消费、收入等指标在绝对量上相当,其在脆弱性程度上却可能大不相同(Celidoni,2013)。Dutta et al(2011)的方法放弃了以往文献对低于给定贫困线生活水平的单一度量,取而代之,参考了每个家户目前的生活水平。其次,如果仅仅利用个人未来生活水平同目前生活水平的差距来衡量贫困脆弱性的话,也只能看出家庭福利状况的脆弱性的波动,而脆弱的家庭未必将来一定贫困。一个月收入从500万下降到100万的家庭,与一个月收入从500元下降到100元的家庭,他们收入的下降幅度、脆弱性程度可能相同,但二者在扶贫方面的意义却相距甚远。换句话说,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家庭比那些目前生活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在未来陷入贫困,因而只考虑脆弱性的方法比较片面。基于此,Dutta et al(2011)提出了基准线(reference line)这一衡量贫困脆弱性的新标准。基准线是在结合了个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标准贫困线(poverty line)而设定的复合标准。在此基础上,贫困脆弱性程度被定义为下一期生活水平相对于基准线的偏离程度。社会贫困线对于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而每个人目前的生活水平不同,因此复合而成的基准线也因人而异,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特征。其次,脆弱性的度量应该考虑到家庭应对风险的措施和能力,因此不仅应该包含收入、消费等传统的衡量脆弱性的维度,也应考虑到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以及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等其他维度的应对脆弱性的能力(Bollinger & Hirsch,2013)。

基准线水平与贫困线水平呈正向相关,即人们未来想保持的福利水平与贫困线呈正相关,因为福利水平低于贫困线是一个严格坏的事情,贫困线水平是人们接受福利水平恶化的底线。而且,基准线水平与人们目前的生活水平的关系是不确定的(Christensen & Subbarao, 2004)。一方面,本期生活水平较高的家庭,未来可能依旧保持前一期的较高生活质量,因而未来的基准线水平可能较高,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当前更高生活水平的家庭可能会降低未来生活所需的最低支出,或者说,

当前生活水平高的家庭在未来遇到风险时可能会动用更多的其他社会资源,比如说积累的资本、人脉等以帮助他们缓解未来的贫困。因此,基准线与目前的生活水平也有可能呈负向相关关系(Grech, 2015)。模型中用基准线代替贫困线的衡量方法强调了家户当前不同的福利水平对未来贫困脆弱性程度的影响,体现出福利状况的跨期自影响(intertemporal self influence),使得脆弱性的度量更具有动态性。

以上各种测量方法都是VEP基本框架下的一种扩展,只不过在考虑决定贫困脆弱性程度的影响时,参考因素有所不同。比如在上述方法中,Pritchett et al(2000)仅以贫困线作为基准参照,只能对哪些家庭是贫困脆弱性的做出判断,而没有对陷入贫困概率的发生机制给出系统阐述。此后的所谓Foster-Greer-Thorbecke指数(简称FGT指数)方法考虑了不同类型的贫困程度对脆弱性的影响,并分析了赤贫家庭的极端脆弱性情况。更后来,Dutta et al(2011)的研究又将与贫困脆弱性相关的心理偏好引入计量模型,其改进之处在于使得衡量脆弱性的基准线被赋予了个体的特征,从而基准线结合了社会贫困线和家户当期的生活水平两个方面,也使得脆弱性的度量更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具有更强的动态性趋势(Alvaredo et al,2013)。从上述研究过程可以看到,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关注的方向不断增多,由只关注消费、收入等单一维度,扩展到关注人们的效用水平、风险偏好、抵御风险的能力、目前生活状态、健康水平等多个角度(Novignon et al, 2012)。比如,Calvo & Dercon(2005)在测度贫困脆弱性时将人们面对未来贫困冲击的心理成本考虑进来,认为脆弱性不仅指较低的预期福利水平,还包含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即人们面对风险的态度是影响个体贫困脆弱性大小的关键因素,因此把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引向了心理学领域。随着测度方法的不断发展,对不同方法的测量准确程度的比较研究也不断发展。Celidoni(2013)曾对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几种主流的方法进行了比较,通过采用相同的数据库,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对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各种VEP方法,Calvo & Dercon(2005)提出的绝对风险密度(absolute risk density)的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和Dutta et al(2011)提出的考虑当前生活水平的测量方法在预测贫困水平方面有更高的准确性。

VEP方法与VEU方法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用

效用的变动来体现福利水平的损失从而推断贫困脆弱性,而 VEP 方法中用对收入、消费函数的估计来推断贫困脆弱性。这里的争论是,VEU 理论认为贫困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福利水平恶化的问题,那么研究贫困脆弱性时 VEP 理论仅以消费、收入等为衡量维度显然不够全面,而用效用水平衡量要好得多;另一方面,应将对风险的考虑纳入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之中,因为贫困脆弱性不仅包含与低生活质量相联系的福利损失,更包含与高预期风险相联系的不确定性(Meyer et al, 2012)。这一点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降低贫困脆弱性必须从降低贫困水平和降低风险程度两个方面入手;任何以提高风险水平为代价来降低贫困水平的政策措施,只能在短期内缓解暂时性的贫困,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贫困脆弱性,也不能精准定位和预测潜在的、迫切需要帮助的贫困者。

(三) 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测量方法

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测量方法由 Dercon & Krishnan(2000)提出,其基本逻辑是家庭在面临风险时如何选择消费使得其效用最大化。他们运用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连续三期的半年度数据研究表明,除了种植风险和家畜的特殊性风险外,季节因素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很大,而大多数运用截面数据或者年度面板数据的研究正好忽略了季节这一重要的因素。不同季节的劳动力需求和价格不同,在劳动力需求旺盛时期,农户倾向于提高消费,而在价格较低时他们的收益将会被打折扣。鉴于家庭消费对冲击十分敏感,基于截面数据的贫困统计会大大低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研究数据表明,后者的比例比前者高 50%~75%,一些农户当前被观测到不贫困是由于他们对变化的季节性刺激做出了增加消费的决策,一旦季度转换,他们便会返贫。尽管 Dercon & Krishnan(2000)研究的是风险冲击的一种特例,但是仍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这一研究框架下,由于家庭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在风险冲击造成家庭福利损失的时候,家庭当期的消费水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消费水平的变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户暴露在不确定性风险之下的后果,被称为风险暴露的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这种方法没有直接对脆弱性水平进行度量,而是通过反映消费水平对风险冲击下的收入变动水平的敏感程度来反映脆弱性程度,实质上就是用消费变动来反映负向冲击下的福利变动。风险对收入造成的冲击越大,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弱,消费水平下降得也越

剧烈。

简要说明如下:考虑一个家庭 i 在时期 t 居住在村落 v 。 $\triangle \ln c_{itv}$ 表示家庭收入的增长率, $S(i)_{tv}$ 表示协同性冲击,即某个村庄里所有农户表示从 $t-1$ 期到 t 期,单位家庭的消费在这一时期都要面临的冲击; $S(i)_{itv}$ 表示每个家庭自身所要面对的独特性冲击; D_v 是一个二值变量序列,用于分别确定是否属于某个村落或社区; X 是表示家庭特征的向量, X_{itv} 中包含了户主受教育年限以及其平方项、社会地位、家庭的规模及其平方项、家庭规模的一阶差分及其平方项。VER 方法用下式测度贫困脆弱性: $\triangle \ln c_{itv} = \sum_i \lambda_i S_{tv} + \sum_j \beta_{itv} S_{jtv} + \sum_{tv} \delta_v (D_{itv}) + \eta X_{itv} + \triangle \epsilon_{itv}$ 。其中, λ 和 β 分别表示协同性冲击 $S(i)_{tv}$ 和独特性冲击 $S(i)_{itv}$ 的影响系数。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这一模型展开的,并一致地运用 $\overline{\triangle \ln y_{it}}$ (村落/社区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来代替 $\sum_i \lambda_i S_{tv}$,用 $\triangle \ln c_{itv}$ 来代替 $\sum_j \beta_{itv} S_{jtv}$ 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常常能验证所有协同性冲击和独特性冲击的联合作用。大量实证研究中都在关注系数 β 是否等于 0,即是否完全风险分担。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尽管完全风险分担的假设常常被拒绝,即 β 显著不为 0,但 β 的估计值普遍很低,这意味着尽管消费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相关,但其相关性大大低于无风险分担假设下的相关性水平(Gloede et al, 2012)。与 VEP 相比,这种方法本质上也属于一种事后测度(Novignon et al, 2012)。

上述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正向和负向的收入冲击具有相反的影响,然而,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在不同农户之间普遍不同。因此,将 β 解释为对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只反映负向冲击)而非对消费保障手段的度量(反映了正向和负向收入冲击两个方面)可能会造成误解。因此 Hoddinott & Quisumbing (2003)主张,对于 $\triangle \ln c_{itv}$ 项,将正向与负向的收入冲击分开计量。先前 VER 方法的研究用 $\overline{\triangle \ln y_{it}}$ 代替协同性冲击,最近的一些研究用对农作物产量冲击度量来替代(Gaiha & Imai, 2008)。比如,定义村落粮食总收入为 C_u ,满足 $C_u = \sum_{j=1}^{n, j \neq i} C_{jt}$, C_{jt} 表示农户 j 在时期 t 的粮食收入, n 是每个村落的农户数量。假设 C_u 具有时间趋势, $\ln(C_u) = b_0 + b_1 T$ 。因此,协同性冲击可以表示为村落层面上的粮食总产量与家庭自身粮食收入半对数形式的一阶差分($S_u = \ln(C_u) - \ln(\hat{C}_u)$),然后便可以依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式进行脆弱性估计。这种对收入冲击分开计量的

方法将VER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VER方法没有对脆弱性进行直接度量,而是由一个敏感程度系数来表示脆弱性的程度,还没有分离出风险对家户的影响和家户对风险响应能力的大小(Ward,2016)。其次,这种方法对消费平滑的应用可能有误导性。消费对收入冲击的敏感度能够反映家庭的脆弱性程度,但是,这种脆弱性程度的高低与家庭是否是贫困并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一个农村家庭获得大麦收成,并还掉麦青季节的债务后,其消费与收入高度相关,然而如果大麦收成不好,略小于均值水平,这一家庭可能因为还不上债务而使得当期消费大受影响。尽管如此,这一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不一定在脆弱性边缘,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贫困家户而进行扶持(Bailey & Danziger,2013)。

三、贫困脆弱性研究聚焦的重点理论问题

贫困脆弱性研究当前聚焦的理论问题有如下三个:(1)使测算贫困人口福利的维度更加丰富,并找到贫困人口福利的最佳分布函数;(2)找到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测量方法、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测量方法之间的比较标准;(3)寻找贫困脆弱性形成的机制。

(一)测算贫困脆弱性的维度以及贫困人口福利的最佳分布函数设定

贫困脆弱性理论亟待突破的第一个领域是使测算贫困人口福利的维度更加丰富,并找到贫困人口福利的最佳分布函数。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人口,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因素更多,或者说,他们的福利对于各种影响因素的弹性更大。因此,定义贫困人口的福利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情况也非常复杂,在没有良好的收入分布刻画前提下,不可能制定有效的精准扶贫政策。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处理上的难度,现在关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研究仍多集中在对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衡量上。但是收入和消费仅仅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或者说福利水平的一个方面。Dercon(2009)曾关注过健康这一维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处在贫困边缘的人口而言,诸多生活必需品常常表现出吉芬商品的特征,也就是一旦略有涨价,就会通过大幅削减其他开支以大幅增加该种商品的购买,其短期效应就是用于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支出被急剧削减,长期效应将是因病致贫。不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经济因素常常只是诱因,个人基本健康条件才是根本因素,因而

家族遗传病、长期营养不良、出生缺陷、致病性不卫生习惯等基本健康条件理应成为预测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Sawada & Lokshin(2001)曾关注过教育维度对脆弱性的影响,认为遭受意外冲击的家庭如果选择通过让孩子退学来节约开支以平滑消费水平,这样的家庭可以被识别为贫困脆弱性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有着代际传递的特征,而且其中的重要机制是,父辈由于缺乏教育致贫,子代由于父辈无法提供教育经费而形成贫困的代际固化。教育对于弗里德曼所说的持久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育是分析和预测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持久收入假说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人们的消费与其说是取决于收入,不如说是取决于持久收入;收入中的暂时性收入,比如没有稳定预期的收入,对于消费的影响很小。消费的方式以及劳动与休闲的替代程度,对于劳动者的生产力恢复和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仅仅从收入上分析贫困脆弱性可能无助于进行机制分析,有必要纳入消费和休闲变量。Calvo(2008)曾以消费和休闲两个维度为例探讨多维度贫困测量的一般方法,但还不具有普遍意义。总的来看,有关健康、教育、休闲等因素如何纳入贫困脆弱性测量,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Ozughalu,2016)。多维度贫困近几年逐渐成为国内外脆弱性实证研究的新热点,而且在不断发展,但对多维度贫困的理论研究还相对缺少。也有研究开始分析个人偏好、信念等因素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Christiaensen & Todo, 2014; Oviedo, 2015)。

在贫困脆弱性的未来预测上,经济学家常常根据本期收入或消费的真实数据,在给定福利水平的分布形式下对未来一期的贫困脆弱性进行预测,显然其解释能力是有限的(Moore, 2001)。福利水平分布形式显然不能主观给定,应针对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不同的分布均值、方差等数据特点,对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采取不同的分布模型进行估计(Nguyen et al, 2015)。初步研究发现,帕累托分布适用于较为贫困的人群(特别是收入排前20%的人群);而伽马分布适用于很贫困的收入群体;针对人群中的最贫困群体,Chaudhuri(2002)认为采取对数分布最为适合。不过,到底采用哪种福利水平的分布函数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寻找不同脆弱性测量方法的比较标准

贫困脆弱性研究亟待突破的第二个领域是找到不同计量方法之间的比较标准。对抗未来贫困的关键在于对贫困脆弱性进行预警(Chaudhuri et al,

2002)。自从 Foster-Greer-Thorbecke(FGT)指数被提出以来,再加入需求、能力以及时间维度(考虑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性)后,Ligon & Schechter(2003)提出期望效用的脆弱性,再到Dutta et al(2011)提出的VEP方法以及Feeny & McDonald(2016)提出的有关多维度反贫困脆弱性一般方法,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参考标准越来越多。根据本文阐述的几种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的测量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测量方法的发展逻辑和进步趋势:在最初的基本模型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符合现实的假设条件,使预测结果越来越贴近现实和问题的本质。不同学者的计量方法研究往往关注经济社会中的某个特定的方面,比如,Dercon(2009)等的方法考虑了人们应对风险时的态度,Dutta et al(2011)的方法关注了人们当期的生活水平,Ligon & Schechter(2003)将贫困脆弱性分解为贫困部分、异质性风险、协同性风险和不可解释的风险等部分以进行测度。不过由于彼此关注的方向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同方法的测度结果难以比较。在实证中,测度某一具体经济进程中的贫困脆弱性程度时,通常将各种方法尽量放在同一起点去比较,即选取一致的数据库,使用不同的测度方法进行回归、预测,将预测值与几年以后的真实观测值进行比较,找出最具解释力度的测量方法。这样的思路从实证上对测度方法的优劣进行了评价,但得出的结论依赖于样本的质量。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都会对结论产生很大影响(Celidoni,2013)。其中的重要计量问题是如何避免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影响。Jensen & Miller(2008)等人使用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方法由于能够比较好地处理选择性偏误,在反贫困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到目前仍未形成具有广泛实践价值的经典测度方法,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从Dercon(2009)以及Dutta et al(2011)等人的研究来看,他们的计量模型可能出现偏误的原因除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某一种特质而忽视了另一种特质,比如过于强调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忽视了消费决策能力或者相反。由于导致贫困的因素非常多,研究人员越来越发现,单个研究人员的研究很难顾及全面,常常容易盲目摸象,需要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全球的相关研究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贫困脆弱性识别标准以及反贫困政策的共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03年成立的贫困行动实验室是一个非常有

益的尝试。集合一个国家的相关研究力量,在一个学术平台分工协作,共同来研究贫困脆弱性人口面临的异质性风险、协同性风险等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反贫困政策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寻找贫困脆弱性形成机制

贫困脆弱性理论研究亟待突破的第三个领域是找到贫困脆弱性形成的机制。发展经济学对于贫困的成因和解决机制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几乎都认为其与贫困的成因具有一致性。不过,很少有文献对区别于贫困的贫困脆弱性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由于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在影响因素、作用原理和解决机制上具有很高的重合性(Dercon,2009),实证研究多采用基于不同理论框架下的各类VEP、VEU、VER计量方法进行预测性研究,而对影响机制的讨论不深入。贫困脆弱性的确是伴随贫困而产生的,但贫困脆弱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路,比如Ligon & Schechter(2003)将贫困脆弱性划分为风险引发部分和贫困引发部分;Gloede et al(2012)进一步将个人风险态度对应于个人应对收入冲击后平滑消费的能力,这些研究都提示可以从个人风险态度与个人处置资产投资关系角度分析贫困脆弱性形成机制。总的来说,关于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研究人员逐步形成的共识是,社会经济条件固然重要,但当事人的偏好、行为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项反贫困计划忽视了后者,计划效果常常会在计划结束后就恶化。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重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的致贫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关注研究当事人的偏好、行为习惯的致贫机制。关于后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Ziliak(2015)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被标注为有不良偏好和行为习惯的概率更高。比如,在希克斯框架下的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偏好比较中,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包含贫困线以上的人口)现期消费对未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更高,简而言之,给定相同的收入约束,这些人愿意用更多的未来消费换取一单位当期消费。这对应到行为习惯上,也即表现为低储蓄或不储蓄,不为未来做未雨绸缪的准备。这种偏好结构常常会在一个贫困家庭中代际传递。Gloede et al(2012)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这种偏好上发生突变,这种力量的脱贫效应比外在的经济扶助脱贫效应更大。此外,在面临多种选择时,贫困边缘的人口会表现出更多的选择错误,也就是说,贫困是他们自己选择出来的贫

困。比如,在确定性收入和有风险溢价的收入中,他们无法进行正确的期望收益计算。还有研究表明,贫困线边缘的人口会表现出更多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习惯,比如不规律的起居,重视饮食口味而忽视营养,等等。当把贫困人口放在新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框架下考察时,常常会发现他们的价格消费曲线以及恩格尔曲线是异常的。当有利于他们改善未来经济状况的产品或劳务价格降低时,他们理应沿着无差异曲线向下移动,也就是增加这种商品来替换更贵的商品,但实际上常常相反。再就是,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按照希克斯分解模型,改善他们未来经济状况的生产资源品不应成为劣质品,也就是说这些产品的收入效应应该为正,但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常常正好相反,生产资源品的收入效应为负,甚至为吉芬商品。这正是外部援助式扶贫一旦结束,他们立即返贫的机制。这些有关贫困线附近人口的偏好和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还需要大力加强。

四、反贫困脆弱性的公共政策制定

贫困脆弱性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Ward,2016)。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原因可分解为平均收入处于低水平和收入波动过大。反贫困脆弱性政策也可归为提升平均收入和提升对风险的应对能力两类政策。对于收入波动高的个体,可以在事前降低风险;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个体,则需要进行转移支付(Gloede et al,2012)。贫困脆弱性还分为暂时性和结构性两种。Glauben et al(2012)认为,对于结构性贫困脆弱性的解决,应依赖于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完善。对于暂时性贫困脆弱性的解决,则应当关注短期收入波动,制定适当的微观经济政策。此外,反贫困脆弱性公共政策如何实施,特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脆弱性

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完善与结构性贫困脆弱性的关系,Chandhuri(2001,2002)、Dutta et al(2011)、Dercon & Krishnan(2000)等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世纪之交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具有很高的波动性,一些国家的贫困率反复波动,虽然总体已经有一些下降,但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各种风险冲击使其极不稳定。个体贫困脆弱性将汇总成国家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贫困脆弱性。由此可以从个人、家庭的脆弱性来评估国家的结构性贫困脆弱性状态,进而提出相应的宏观

政策。

对于宏观政策如何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近几年的研究分别聚焦于社会综合保障体系、公共转移支付、公共产品供给、养老保险、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方面(Chandhuri,2002)。

1. 社会保障体系与贫困脆弱性。Mosley & Verschoor(2005)的研究表明,存在贫困或贫困脆弱性恶性循环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家庭多是风险厌恶的,他们会尽量避免高风险行为。这种风险厌恶特征似乎可以使他们免受破产的危险,但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很多提高收入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信用市场往往不完备(Feeny & McDonald, 2016),意味着需要抵押贷款,结果导致资产匮乏的家庭不会采用这种高风险高收益计划。为了降低风险,资产匮乏的家庭只能参与低风险、低回报的活动,使得他们与资产充足家户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增加了陷入贫困的概率。Gloede et al(2012)在泰国和越南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虽然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率下降了,但是暂时性贫困率仍然很高,尤其是农村地区。研究发现,贫困使人更加厌恶风险,贫困的人们在决策时会将自己先验地置于有风险的背景下,在确定性收入项目和期望收入更高的不确定收入项目中,他们常常会选择前者。对于他人、企业、政府提供的任何含带风险的脱贫项目,他们都不愿意参与。因此,贫困不仅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还会通过影响风险态度造成间接影响,形成贫困固化。由此,建立稳固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抗击贫困脆弱性具有基础性作用。Walker et al(1990)、Sebastián(2010)提出,应该设立特殊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护贫困边缘的人不落入贫困线以下。首先,建立失业后、就业前的基本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也给予他们特殊的便利和优惠;最后,在银行借贷、金融投资、意外保险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以便帮助贫困脆弱性家庭走出贫困脆弱性恶性循环(Ziliak,2015)。覆盖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能显著降低参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发达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是减弱老年人贫困脆弱性的必要条件(Walker et al, 1990; Sebastián, 2010)。

2. 公共转移支付与贫困脆弱性。公共转移支付对于减弱贫困脆弱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均衡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当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常常会形成“核心—边缘”的结果,即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边缘地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中心地区

发展越快,边缘地区受到的压制越严重,因此边缘部分的家庭的贫穷脆弱性更大(Kakwani & Subbarao, 2007)。GDP增长转化为阻碍减贫力量的原因在于边缘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未能享有应有的份额。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和农村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差距巨大,农村人口和家庭坠入贫困脆弱性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因而由发达城市向落后农村进行公共转移支付,对于降低减弱贫困脆弱性是有意义的(Gloede et al, 2012)。

3. 通货膨胀与贫困脆弱性。以 Morduch(1994)的研究作为基础,经济学家逐步发现,稳定的货币政策和可以预期的低通胀是反抗贫困脆弱性的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条件。不稳定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恶性通胀是引发贫困脆弱性增加的重要宏观经济原因。先看标准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体中货币循环的过程。包括具有贫困脆弱性的家户,一般都是工资收入者,依靠工资收入购买生活必需品,收入更高的家户用部分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增进人力资本(以期望未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剩余部分存入银行获取利息(Alejandro de la Fuente, 2010)。此外,家户还要向政府交所得税。企业从金融机构那里获得投资,在要素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生产产品,在产品和服务市场销售获得收益。这些收益一部分弥补企业内部的成本,一部分给金融机构作为投资分成,一部分作为税款交给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利润的提成)。政府可能直接发行货币购买产品和服务,也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基础货币,通过金融系统获得铸币税。政府获得的利润、一般税收、铸币税除了购买产品和劳务外,还需用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支持教育事业等。教育机构为家户增进人力资本,防止社会的收入固化和贫困固化;同时,教育机构也需要购买产品和服务。Dercon & Krishnan(2000)的研究表明,单一市场价格的波动、一般价格的波动均会促使货币循环体系中接近贫困家户的贫困脆弱性增加。在上述经济体中的货币循环过程中,假设一个家户处在贫困边缘,月工资收入用于购买居家必需品后还有微弱部分正好用于子女教育投资。如果政府允许金融机构多发行一些基础货币,商业金融机构将增发货币投资于企业,必然要求获得投资回报。从卢卡斯模型可知,货币扩张不一定会导致产量增加,而是全部转化为物价上涨。比如,要素市场上实际工资并没有上涨,劳动供给也就不会增加,因而产品市场的产量也不会增加。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贷

款后一方面不能增加供给,另一方面还要给予金融机构投资回报,企业想到的办法只会是涨价。那么该贫困边缘的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更大,很可能会挤出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导致该家庭子女辍学,甚至进一步挤出生活必需品支出,引发了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Sawada, 2001)。Dercon & Krishnan(2000)的计算表明,在这一货币循环体系中,哪怕是商品市场需求、劳动力需求以及工资由于通胀导致了微弱的变化,新的贫困脆弱性家户比例也会显著增加,甚至可能高达 50%以上。通货膨胀还会极大地弱化贫困边缘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由 Chandhuri(2001, 2002)的研究来看,家庭的财富水平、目前的收入水平、未来收入的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其平滑消费的能力。未来期里,人们会动用自己的存款、向他人借款,或者其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保险措施来平滑单个家庭消费的变动,以使得各期具有相对稳定的消费,但是贫困边缘的家庭的财富水平以及他们的各种经济预期都极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Gerry & Li, 2007)。一些家户当前被观测到不贫困是由于他们对于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做出了减少消费的决策,一旦周期转换到通货膨胀阶段,他们便会返贫。历史数据表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处于通货膨胀的时期远比物价稳定的时期多,因而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将形成贫困脆弱性的积累效应(Skoufias & Quisumbing, 2005)。

此外,贸易开放度也对贫困脆弱性有影响。对于货币体系不完善,极易发生通货膨胀,并且容易受到输入型通胀影响的国家,更大的贸易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冲击。并且,这类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热钱的攻击,所以,更大的贸易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人口和家庭有更大的贫困脆弱性(Morduch, 1994)。而对于货币政策稳定的国家,适当的贸易开放对于减弱贫困脆弱性是有帮助的(Barrientos et al, 2003)。

(二)微观经济政策与贫困脆弱性

一般而言,增加整体就业的计划对于减少贫苦脆弱性尤其重要(Gloede et al, 2012)。这里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就业数量的增加,还不能低估劳动力价值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否则必然引发制造业空心化。如果分配体系是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组织生产投资的企业和组织资本在资本市场套利的企业不对称发展(Meyer et al, 2012)。短期来看,劳动力价格低有助于降低制造业产品成本,对于生产性企业是有益的。但长期来看,

劳动者工资低将使得全社会消费不足,制造业产品出现相对需求的过剩,这将导致生产性企业萎缩。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回报比劳动力回报高得多,生产性企业的企业家获得利润后会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业,而是进入高利润金融业,这将进一步推动生产性企业萎缩,其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价值被低估导致劳动者陷入贫困的概率更高,贫困脆弱性被固化(Imai et al, 2015)。由此看来,提高劳动者价值在分配体系中的比例对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就业政策外,Gloede et al (2012)指出,将一部分就业通过产业延伸到易发贫困脆弱性的地区是一个有效的减贫办法。越来越多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中个人的收入不仅仅来自于农业,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产业延伸而来的非农经济活动的收入(比如手工业贸易、农产品网络销售等)(Imai et al, 2015)。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部分非农经济活动是效率低下的,只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一个小小的补充,但近年来人们发现这部分收入越来越重要。在非洲,来自非农活动的收入占到家庭收入的34%,在拉丁美洲占到47%,在亚洲占到51%(Imai et al, 2013)。这是产业结构变化、全球化以及农业商业化对农村的重要影响,其对于减弱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重视(Imai et al, 2015)。根据 Imai et al(2013)的研究发现,亚洲地区非农经济活动收入的比例在逐步提高,中国和印度大约占到40%,而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则占到了70%。在耕地不断减少的背景下,非农经济活动使得贫困农户的就业增加,从而为减少贫困脆弱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越南的贫困人口比率从2006年的21%下降到了2008年的13%;印度从1994年的45%下降到了2009年的32%。商业资本对于农村的延伸也使得农户收入增加,并相应增加了农户的教育和健康投资,从而降低了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政府引导商业活动延伸到农村,包括为偏远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对于降低贫困脆弱性都具有重要意义(Celidoni, 2013; Imai et al, 2015)。

(三) 贫困脆弱性公共政策的实施

关于如何实施反贫困脆弱性计划,Klasen & Waibel(2014)等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参考。传统的反贫困计划用的衡量贫困状态的数据包括贫困人口数量(headcount poverty)、贫困差距(poverty gap)、贫困严重度(poverty severity)。贫困人口数量指的是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贫困差距指的

是贫困人口与贫困线水平之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基于这些测量方法来制定反贫困政策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些指标都是事后的,只能在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贫困后才能给出。如前所述,制定政策最需要的是知道哪些导致人们最有可能发生贫困这样的事前指标。现在不贫困人口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贫困人口,现在贫困人口也有可能变得更加贫困或者脱离贫困(Islam et al, 2015)。比如巴基斯坦潘加博省2010年的大洪涝灾害导致本来远超贫困线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在这个案例中,根据世界银行(2010)的估计,其相关人口中有64%本来就是具有“极大贫困脆弱性”的,如果能够及时知道这一信息,就能有效预防这些人一旦碰到灾害就陷入贫困。这个例子的理论意义是,在某一个时点观察到的“经济状态”,不应作为预测贫困脆弱性的唯一依据。由此,将哪些指标纳入进来用以研究对象有多大的可能性落入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用哪些指标测量特定人口的贫困脆弱性,显得尤其重要(Feeny & McDonald, 2016)。学者们建议,反贫困政策的核心任务在于,要研究出哪些措施能够分别减少“人头数的贫困脆弱性”(headcount vulnerability),“脆弱性差距”(vulnerability gap)以及“脆弱性严重程度”(vulnerability severity)。所谓“人头数的贫困脆弱性”是指可能跌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一个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脆弱性差距”是指特定人口的福利水平(用消费水平等指标衡量)低于最低福利水平的平均差距;“脆弱性严重程度”是指在识别出的具有贫困脆弱性特征的人口中,“脆弱性差距”的分布状态(比如用概率密度函数表示的分布)。

除了这种细致的贫困脆弱状态分析,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出“贫困引发的脆弱性”(poverty-induced vulnerability)和“风险引发的脆弱性”(risk-induced vulnerability)。贫困引发的脆弱性是由低的期望消费水平引发的,而风险引发的脆弱性是由于期望消费水平的突变引发的(有可能期望消费水平事先是高于门槛值的,但后来急剧下降)。对于风险引发的贫困脆弱性,如前所述,还需要区分出是独特性冲击还是协同性冲击。居民由于疾病引发的贫困脆弱性称之为独特性冲击引发的贫困脆弱性,而一个地区发生的洪灾和旱灾则称之为协同性冲击。还有必要找到每一个地区这些细化指标的差异,只有这样才有针对性。比如,对于由于风险引发贫困脆弱性的人口而言,需要的反贫困政策是保险计划;对于由于

贫困引发脆弱性的人口而言,需要的是提高他们资源禀赋的计划(比如教育提升计划、健康提升计划等)。并且,对于独特性冲击或者协同性冲击引发的贫困脆弱性,引入的保险计划是不完全一样的,前者需要进行面对家户的保险计划,后者需要面对一个地区的风险防范计划。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哪些特质的人(比如哪些地区的人,哪些资源禀赋状态的人)更容易受到独特性冲击,哪些容易受到协同性冲击。有学者发现,在巴基斯坦的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口比没有土地的人面临独特性冲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能够获得金融资源的农村人口比不能获得金融资源的农村人口面临的与健康相关的独特性冲击也小得多。两个地区的贫困脆弱性一样,但有可能脆弱性差距和脆弱性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采用的政策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Azeem et al(2016)发现,一旦一个城市拥有和农村一样的贫困脆弱性,城市的脆弱性差距常常比农村还要高,因而城市居民遭受独特性冲击和协同性冲击后致贫的可能性更高。正如Klasen & Waibel(2014)指出的那样,政策制定者还远远没有进行这样细致的反贫困规划研究。当前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如何应对独特性冲击引发的贫困脆弱性上。这是因为,面临独特性冲击的家庭常常不是陷入暂时性贫困,而是会陷入长期慢性贫困。进一步地,造成一些家庭容易受到独特性冲击的原因不仅仅是家庭自身的原因,还有社会的结构性原因,是一些社会计划把他们遗漏了,或者他们是改革的成本付出者(Celidoni, 2013)。这些人需要与教育或者健康相关的长期投资计划方面的帮助。不过,当前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随着自然灾害特别是环境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大,由于自然灾害突发以及大面积持续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反击协同性冲击引发的贫困脆弱性应该是越来越重要的研究课题。再者,当前的政策实施将重点聚焦在农村的反贫困计划中,而事实上,未来的贫困脆弱性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大。联合国(2014)预测,到2050年,全球66%的人口将住在城市,城市化最快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的教育、健康、资源禀赋状况落后于先进入城市的人口,他们对独特性冲击和协同性冲击的应对能力会更弱。因而,城市化进程中相关人口的“贫困水平”、“贫困差距”、“贫困严重程度”以及“贫困脆弱性”、“脆弱性差距”、“脆弱严重性”都需要细致的研究。进一步地,这些人中由于贫困

引发的贫困脆弱性比例有多大?由于风险引发的贫困脆弱性有多大?在风险引发的贫困脆弱性中,独特性冲击和协同性冲击引发的脆弱性各有多大?在实施扶贫政策前,都需要先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回答。

关于制定精准帮扶政策,Pritchett et al(2000)、Ligon & Schechter(2003)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贫困脆弱性家庭(或个人)的统计比例会高于贫困比例。根据 Pritchett et al (2000)的预测,在预先给定贫困线的情况下,总人口中贫困脆弱性人口比重远高于总贫困人口比重,由其模型可计算出贫困线以上还有很多人口存在非常大的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所以,按照 Pritchett et al (2000)的研究,应该改变过去仅仅参照贫困线寻找政策对象的做法,而是定义陷入贫困的临界值,寻找概率大于这一临界值的贫困脆弱性家庭。定位到贫困脆弱性家庭之后,应该建立贫弱脆弱性数据监测体系(Ligon & Schechter,2003)。对于贫困地区接近贫困的人口,要监测他们的食品支出、家庭收入状况、雇佣状况以及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状况,按照 Ligon & Schechter(2003)的模型精确计算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其协同性风险、独特性风险降低福利水平的影响。还可以按照 Hoddinott & Quisumbing (2003)提出的贫困脆弱性概率计算法,对不同贫困脆弱性家户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进行比较,显示出不同的家户陷入贫困的深度差异,这样有助于定位那些对扶贫政策需求最迫切的贫困人口,从而提高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需要针对不同的性别、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区、不同土地拥有数量、不同职业、不同风险态度以及不同健康状态的贫困脆弱性人口实施差异化政策(Ward, 2016)。以不同风险态度、不同健康状态为例进行,Dutta et al(2011)与 Dillman & House(2013)等提出,应该用贫困线水平以及目前生活水平复合计算的指标来测量贫困脆弱性。即使不同家庭低于贫困线所代表的消费、收入等指标在绝对量上相当,其在脆弱性程度上却可能大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风险态度可能非常不同,因而要针对这种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扶贫政策。对于其中占少数的风险爱好者,可以用支持创业等办法进行帮扶;而对于绝大多数风险规避者,应该用教育领域的转移支付等办法帮扶(Novignon et al,2012)。Hoddinott & Quisumbing(2003)发现,居民健康水平每下降10%,会导致贫困脆弱性水平上升6%,由此,建立有效的健康风险防范机制有利于制定前瞻性的反贫

困政策,特别是对于易患疾病的人口。对于农村人口,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和重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支出是解决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面是巴西的繁荣,另一面却是印度的贫困人口福利没有任何改善的现象,被称为“不平等螺旋现象”。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除了中国外,30多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并没有大幅减少全球贫困人口。这促使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研究焦点由经济增长转向如何减少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上来。在研究、制定和实施反贫困计划的艰难进程中,人们发现,贫困脆弱性、脆弱性差距、脆弱性严重程度是比贫困人口数量、贫困差距和贫困严重程度更有启发意义的指标。由此,贫困脆弱性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热点问题。贫困脆弱性预警有助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的贫困定位,防患于未然,便于从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开展精准扶贫。我国当前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进行扶贫、减贫,国外有关贫困脆弱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 Alejandro de la Fuente(2010), “Remittances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rural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38 (6):823—839.
- Alvaredo, F. et al(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3—20.
- Azeem, M. M. et al(2016),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Punjab, Pakistan: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44:57—72.
- Bailey, M. J. & S. Danziger(2013), *Legacies of the War on Pover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arrientos, A. et al(2003), “Old ag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ibutions and dependence in later life”, *World Development* 31(3):555—570.
- Bartfeld, J. et al (2015), *SNAP Matters: How Food Stamps Affect Health and Well Bei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llinger, C. R. & BT. Hirsch(2013), “Is earnings nonresponse ignorabl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2):407—416.
- Calvo, C. & S. Dercon(2005), “Measuring individual vulnerability”, *Economics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299*,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 Calvo, C. (2008), “Vulnerability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eru, 1998—2002”, *World Development* 36(6):1011—1020.
- Celidoni, M. (2013),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Applied Economics* 45(12):1493—1506.
- Chaudhuri, S. (2001), “Empir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audhuri, S. (2002),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Concepts, empirical methods and illustrative examples”, Working Paper, Columbia University.
- Chaudhuri, S. et al(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Research Gate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 Christiaensen, L. J. & K. Subbarao(2004),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 14(4):520—558.
- Dercon, S. (2009), “Rural poverty: Old challenges in new context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4(1):1—28.
- Dercon, S. & P. Krishnan(2000), “Vulnerability,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25—53.
- Dillman, D. A. & C. C. House(2013), *Measuring What We Spend: Toward a New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Dutta, I. et al(2011), “On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37(4):743—761.
- Feeny, S. & L. McDonald(2016), “Vulnerability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Findings from households in Melanes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2(3):(3):1—18.
- Gaiha, R. & K. Imai(2008),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Estimates for rural Indi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 No. 40.
- Gerry, C. & C. Li(2007),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vulnerability in Russia”,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885.
- Glauben, T. et al(2012), “Options trading in agricultural futures markets: A reasonable instrument of risk hedging, or a driver of agricultural price volatility?”, *World Development* 40(4):784—795.
- Gloede, O. et al(2012), “Shocks, individual risk attitude,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Hannover Economic Papers* 71: 54—78.
- Grech, A. (2015), “Evaluating the possible impact of pension reforms on elderly poverty in Europ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9(1):68—87.

- Haughton, J. & S. Khandker(2009), *Handbook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Hoddinott, J. F. & A. R. Quisumbing(2003), “Data sources for microeconometric risk an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0324, The World Bank.
- Imai, K. S. et al (2013),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Its genesis, severity and impact on poverty and hung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 (8):1105–1116.
- Imai, K. S. et al(2015), “Does non-farm sector employment reduce rural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36:47–61.
- Islam, T. et al(2015), “On persistent poverty in a rich countr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81(3):653–678.
- Jensen, R. T. & N. H. Miller(2008), “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4):1553–1577.
- Kakwani, N. & K. Subbarao(2007),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 role of social pens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6):987–1008.
- Klasen, S. & H. Waibel(2014),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South-East Asia: Drivers, measurement, responses, and policy issues”, *World Development* 71:1–3.
- Ligon, E. & L. Schechter(2003),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113(486):95–102.
- Meyer, B. D. et al(2012), “Winning the war: Poverty from the Great Society to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45(2):133–200.
- Moore, K. (2001),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PRC Working Paper 8,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Morduch, J. (1994),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221–225.
- Mosley, P. & A. Verschoor(2005), “Risk attitudes and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7(1):59–88.
- Naude, W. et al(2009),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An overview and introductio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7 (3):183–191.
- Nguyen, L. D. et al(2015), “Rural-urban migration,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and welfare in Vietnam”, *World Development* 71:79–93.
- Novignon, J. et al(2012), “Health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Ghana: Evidence from the Ghana living standards survey round 5”, *Health Economics Review* 2(1):1–9.
- Ozughalu, U. M. (2016),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food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to food poverty: Evidence from Nigeri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5(2):567–587.
- Pritchett, L. et al(2000),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proposed measure applied to Indone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 2437.
- Ravallion, M. & S. Chen(2006),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1–42.
- Sawada, Y. & M. Lokshin(2001), “Household schooling decisions in rural Pakista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4.
- Sebastián, S. (2010), “Old-age pensions in Spain: Recent reforms and some of their consequences for the risk of povert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2(2):197–210.
- Skoufias, E. & A. R. Quisumbing(2005), “Consumption insura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synthesis of the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thiopia, Mexico and Russia”,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7(1):24–58.
- Walker, T. S. & J. G. Ryan(1990), *Village and Household Economics in India’s Semi-Arid Trop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ard, P. S. (2016), “Transient poverty, poverty dynamics,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a balance panel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78:541–553.
-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iliak, J. P. (2015), “Income, program participation, poverty,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Research and data needs”,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40(1–4):27–68.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李仁贵)